

西汉帝陵遗产研究进展与空间认知保护动向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Heritage and Spatial Conservation Trends

吕兰琦 李奕成*

LÜ Lanqi, LI Yicheng*

摘要

西汉帝陵遗存系统确立了中国古代帝王丧葬制度,是中国首个长期稳定大一统王朝权力与社会的象征性历史物证,引发了考古、历史、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等学科持续关注。借助 CiteSpace 对中国知网数据库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分析西汉帝陵研究的热点与现状,并聚焦空间认知与保护实践学术成果,梳理研究进展。西汉帝陵研究在历程上呈现从考据、制度、保护到展示的逐步演进,在内容上集中于本体空间认知与土遗址保护、遗产的公园化保护理念及其规划转型、文旅融合的帝陵整体保护与空间适应性协同 3 个层面,但仍存在学科交叉不足与空间实践短板。未来应加强多学科协同,推进风景园林视角下的多尺度地景阐释,深化“城-陵”空间耦合研究,完善遗址公园游观体系与运营机制,促进社区融合与可持续活化,以提升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水平。

Abstract

The remains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systematically established the funerary practices of ancient Chinese emperors, and served as China's first enduring symbol of unified dynastic power and society. It has attracted sustained attention from disciplines such as archaeology, history,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eservation. This paper conducted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through the CiteSpace platform, based o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examining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current status of Western Han imperial tombs. The study focuses on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spatial cognition and conservation practices, sorting out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cognition of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Research into the imperial tomb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has evolved progressively from textual criticism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 to conservation and present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it focuses on three key areas: the spatial perception of the tombs themselves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earthen archaeological sites; the concept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through park-style management and the associated planning transition; and the holistic conservation of imperial tomb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ulture and tourism, alongside spatial adaptation and coordination. However, there remain shortcomings in terms of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spatial implementation. Future efforts should strengthen multidisciplinary coordination, advance multiscale landscape interpretation from a landscape architecture perspective, deepen research into the spatial coupling between cities and mausoleums, refine the visitor experience system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heritage parks, and promote community integration and sustainable revitalisation. These measures will enhance the level of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tilisation.

关键词

西汉帝陵; 文化遗产; 空间认知保护; 文献计量分析

Keywords

Imperial mausoleum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Cultural heritage; Spatial cognitive conservation; Bibliometric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25-08-26

修回日期: 2025-12-19

文章亮点

1) 将文献计量可视化同政策解读相结合, 构建以计量分析结果为线索的质性综述路径, 从而系统呈现帝陵研究热点与阶段性演进特点。2) 立足风景园林空间视角, 构建“空间认知与土遗址保护-公园化保护与规划转型-文旅融合与空间适应性协同”三位一体的空间认知与保护框架, 不仅梳理了帝陵保护利用的内在逻辑, 更为风景园林学科介入大遗址保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

作为兼具物质性与精神性的人类文明载体, “陵寝”类遗产不仅可以体现古代社会权力结构、丧葬信仰、艺术成就与营建技术, 还能折射当时的政治背景、思想流变、宗教礼制^[1]。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 已将泰姬陵 (Taj Mahal)、埃及金字塔 (Egyptian pyramid) 等陵寝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构建起全球陵寝遗产保护体系。在具有悠久文明发展史的中国, 古代先民信仰“灵魂不灭”, 重视营陵事务, 因而我国拥有数量巨大、类型丰富的陵寝遗产。“事死如事生”的帝王们尤重营陵, 其帝陵工程规模宏大、工法考究、建制复杂, 所蕴含的历史信息丰厚。我国现存的古代帝陵已全部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是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西汉为中国首个长期稳定大一统王朝, 其帝王陵寝以高大的封土为核心, 成为京畿区乃至国家的重要标志物, 奠定了我国古代帝王陵寝营造范式。在西汉帝陵遗产中, 阳陵于 2010 年被列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杜陵于 2017 年入选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茂陵于 2025 年 8 月入选第五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9 年国家文物局同意将西汉帝陵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反映出西汉帝陵遗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逐渐被重视, 且风景园林专业在西汉帝陵遗产的遗存空间保护与展示利用等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 在西汉帝陵及其周边环境考古、遗产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进展的当下, 为系统性地认知西汉帝陵, 梳理其研究进展, 并从风景园林学科角度进行思考、讨论, 有助于协同多学科助力西汉帝陵遗产的空间保护与利用。

基于此,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 借助 CiteSpace 6.4 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 通过调试相关参数, 绘制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突现词与年度发文量图表^[2]; 并结合学科分布与不同时期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演进, 分析其热点发展, 重点整理西汉帝陵空间认知与保护研究进展, 以期明确风景园林及相关学科面向西汉帝陵遗产活态保护与利用领域未来应优先推进的研究与实践路径。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数据源自中国知网数据库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首先对西汉帝陵进

行整体搜索, 再补充搜索西汉单体帝陵^①, 以全面获取主题文献; 继而依据文献的题目、摘要、内容进行二次筛选, 在剔除报纸、图书、重复文献及低关联性文献后, 共获得 437 条有效数据。其中, 期刊论文 333 篇, 学位论文 85 篇, 会议论文 19 篇。

接着将筛选所得文献数据导入 CiteSpace 6.4 进行分析。首先, 通过关键词共现网络图谱识别西汉帝陵的研究倾向; 再借助突现词图谱, 结合对应时期帝陵保护与研究的政策背景与形势, 揭示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与成因; 最后, 结合年发文量趋势总结出西汉帝陵阶段性研究特征, 并搜集聚焦其遗产空间保护的相关文献。

2 西汉帝陵研究热点及其阶段性特征

2.1 研究热点

2.1.1 关键词聚类

研究通过聚类分析提取 10 个关键词^②: “#0 汉阳陵”“#1 西汉”“#2 西汉帝陵”“#3 阳陵”“#4 土遗址”“#5 保护规划”“#6 大遗址”“#7 陶俑”“#9 杜陵”“#14 微生物”(图 1)。基于聚类信息与时间线 (图 2), 可以总结出 3 个研究焦点:

1) 以具体帝陵为代表的核心集群, 包括“#0 汉阳陵”“#3 阳陵”“#9 杜陵”等聚类。自 2001 年以来, 这些帝陵始终是研究焦点, 与之相关的考古发掘、形制结构等关键词也长期稳定出现。其核心原因在于, 阳陵与杜陵是目前考古发掘最全面、完整的西汉帝陵。此外, 阳陵陵区的布局具备“样本”意义, 其后营建的茂陵、平陵及杜陵等帝陵的布局形制均与其相仿, 形成了“阳陵模式”^[3], 故阳陵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2) 以具体问题为核心的技术集群, 表现为“#14 微生物”聚类。研究分布于 2009 年至 2016 年, 表明随着科技发展, 帝陵保护趋于精细化、科学化, 关注点深入至“微生物病害”。

3) 以保护理念为核心的策略集群, 包括“#5 保护规划”“#6 大遗址”“#4 土遗址”等聚类。自“大遗址”概念^③及相应政策纳入文化遗产领域以来, 西汉帝陵作为大型不可移动土遗址, 其本体保护以及在大遗址区实现协同保护的问题受到学界关注。2004 年至今, “保护规划”“保护利用”等核心议题持续引领相关研究。西汉帝陵的文物保护规划措施也由“文物本体-封土环境-微生物病害”的抢救性保护,

① 以“西汉+单体帝陵”“汉+单体帝陵”为关键词进行搜索, 单体帝陵包括: 长陵、安陵、霸陵、阳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义陵、康陵。

② 标签“#”后的数字越小, 说明该聚类的相关关键词及文章数量越多, 直观展示了西汉帝陵的研究热点与视角。

③ 《1997年由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第一次使用了“大型古文化遗址”的提法。

向“生态修复-公园化-文旅融合”活化保护转型。

2.1.2 关键词突现

梳理各时期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背景与文件，并结合突现词图谱（图3），以明晰帝陵研究热点变化。西汉帝陵研究热点从“经济功能探索”逐渐向“保护体系构建”过渡。近年来，在“申遗目标”与“科技赋能”的双重推动下，西汉帝陵个案研究得以大量深入开展。

1978年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经济发展。基于此宏观背景，帝陵的经济功能及其附属结构陵邑自1998年起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热点，1999年汉景帝阳陵博物院建成并对外开放，进一步强化了学界对帝陵经济功能的关注，使相关研究成为持续7年的学界热点。2001年，最后一批（第五批）

西汉帝陵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着其保护工作步入新阶段。以阳陵的保护展示体系为示范，国家文物局于2008年评定汉景帝阳陵博物院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2010年阳陵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2—2015年，文物保护工作持续深化，国家文物局先后批复同意长陵、霸陵保护规划编制立项，核准实施渭陵、延陵封土抢救性保护工作，并同意五陵塬片区遗址公园、茂陵、渭陵、安陵邑以及长陵的保护设施建设工程立项^①。系列政策的推进与考古调查的深入，直接推动了“保护”“博物馆”等词成为研究热点。

此后，随着科技考古、大遗址保护理念与遗产展示利用的深化发展，借助显微结构和扫描电镜深入研究帝陵出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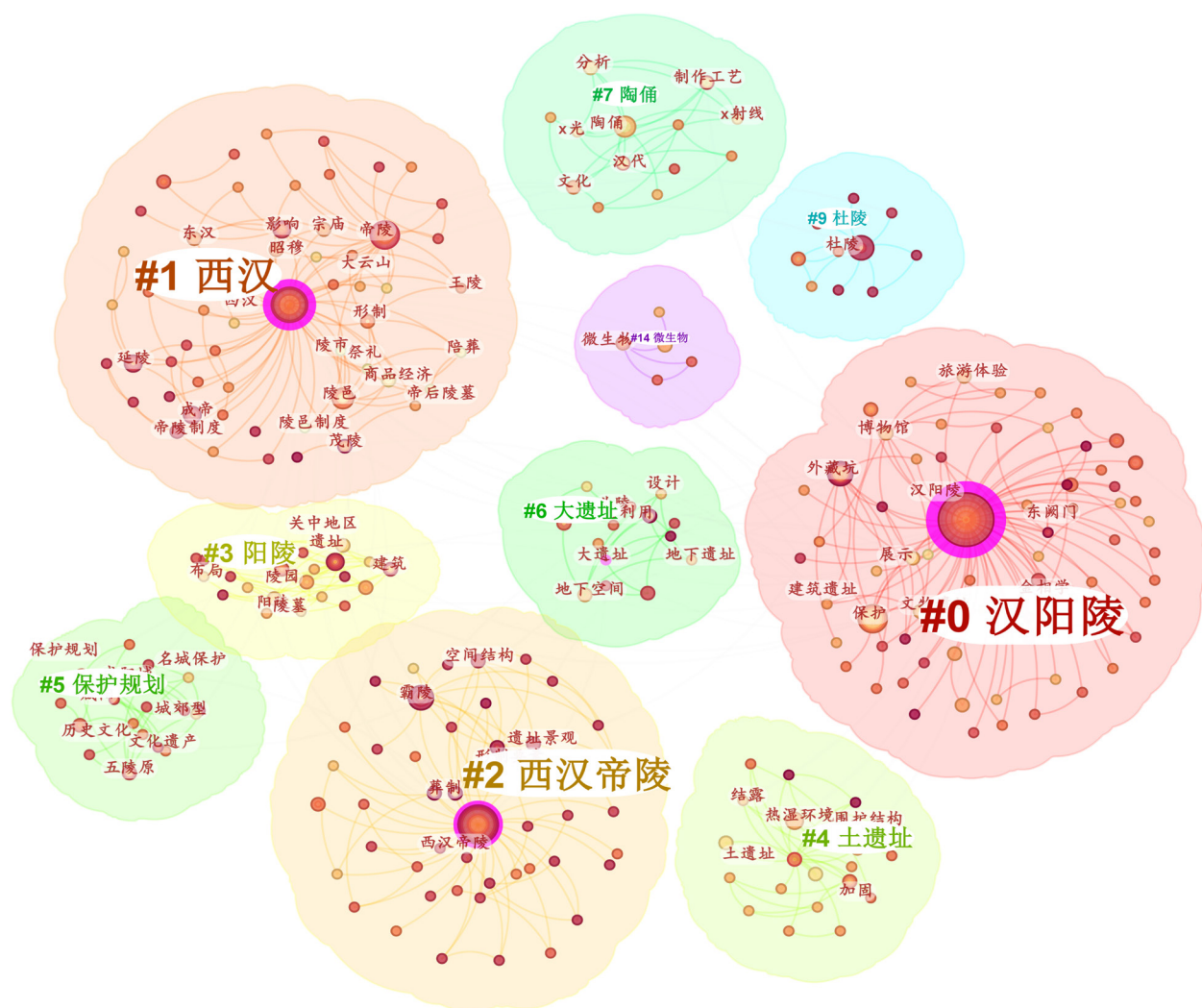


图1 关键词聚类图谱

Fig.1 Keywords clustering map

^① 2012年2月23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长陵文物保护规划申报立项的请示》；2015年3月3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呈报汉霸陵保护规划立项的请示》；2012年5月15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上报汉长陵、安陵、渭陵、延陵封土抢救性修复工程方案的请示》，原则同意对渭陵、延陵封土进行抢救性保护，暂不同意实施长陵、安陵封土抢救性保护工程；2014年5月22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茂陵保护设施建设工程立项的请示》；2014年6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西汉帝陵（五陵塬片区）遗址公园概念规划立项的请示》《关于西汉帝陵（渭陵）保护展示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西汉帝陵（安陵邑）保护展示工程立项的请示》《关于长陵保护展示工程立项报告的请示》。

物、围绕帝陵陵园的遗址公园规划设计与遗迹展示成为核心议题。

2019年，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将汉唐帝陵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的请示》，同意将西汉帝陵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21年，西汉帝陵入选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与“十四五”时期大遗址名单。杜陵、霸陵个案研究的关注度持续增加。

从突现词图谱反映的阶段性演化看，研究议题从功能解释转向保护治理，研究对象由帝陵整体系统转向帝陵本体与重点个案，西汉帝陵研究热点出现结构性偏移。由此引发2个问题：1) 持续的考古发现引发学术焦点与讨论（如考古发现霸陵首次出现双重陵园等），但如何开展与历史认知相适应的帝陵遗产的空间保护实践，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2) 近年来个案研究多聚焦以封土为核心的帝陵陵园，回避对帝陵其他组分的讨论。如汉高祖至汉宣帝时期的西汉帝陵实施“陵邑制度”，陵邑作为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奉陵作

用，同时是汉廷移民“实关中”政策落实的载体。陵邑遗产在持续的城镇化过程中遭遇不可逆转的损害，地面遗迹几近湮灭。若不进行抢救性的研究，并将其纳入空间保护，或将造成西汉帝陵遗产原真性与完整性受损。

2.2 阶段性历程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年发文量（图4）与时区图谱（图5）总结西汉帝陵研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西汉帝陵相关文献年发表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但近年来有所减少，关注度降低。

1) 初步探索阶段（1972—1997）：1971年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体系恢复重建。伴随遗产保护意识的觉醒^①，西汉帝陵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但此时学术成果积累相对薄弱，因而文献产出量维持低位，研究多聚焦帝陵出土物的考据，尚未形成系统性的研究框架。

2) 历史认知阶段（1998—2003）：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田野考古引入遥感技术与地理信息系统等方法，加之文化遗产保护建设的推进^②，西汉帝陵研究进入了陵寝制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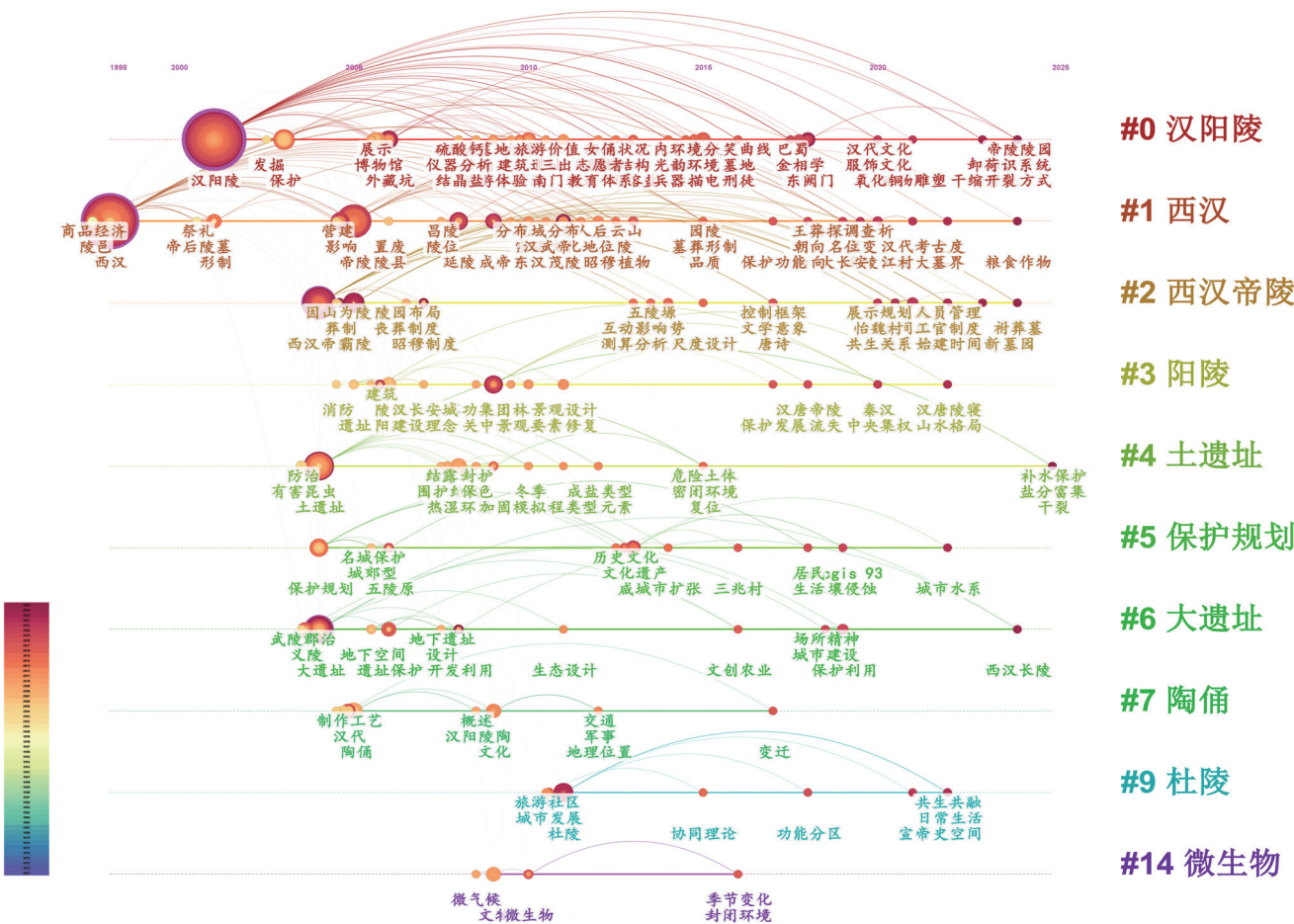


图2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Fig.2 Keywords timeline map

① 1982年中国发布了第一部关于文物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使文化遗产保护逐渐制度化与规范化；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增加，保护意识增强。

② 1999年颁布的《关于拟将我国大遗址保护展示体系建设规划列为十五计划专项的指示》首次对大遗址进行定义，西汉帝陵作为其中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的陵寝墓葬受到极大关注。

探索时期。该阶段文献数量相较上一时期增多，研究内容在延续上一时期对出土物考据的基础上，也聚焦于帝陵形制布局、礼制文化等方面，并初步对陵邑建制原因、兴废情况进行讨论，推动了帝陵历史研究的体系化发展。

3) 遗产保护阶段(2004—2015)：21世纪初，在我国文化遗产政策的引导推动下，西汉帝陵研究主要聚焦于遗产保护。2006年启动的西汉帝陵大遗址考古项目与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协同开展，对西汉帝陵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编制形成《西汉帝陵钻探调查报告》，为遗产认知与保护实践筑牢资料基础。“十一五”规划期间，西汉帝陵被列入100个国家重点保护大遗址项目。2013年“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西汉帝陵作为其沿线的重要文化节点，国际认同度显著提升。西汉帝陵遗产保护领域发文量大幅增长，主要探讨遗址空间保护、遗存本体保护与开发利用等。

4) 遗产展示阶段(2016—2025)：因帝陵地下空间不主动开发的学界共识^①，以及当前地下探测技术瓶颈制约，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主要基于已获取的西汉帝陵的形制结构认知，并结合西汉历史人文与长安地区其他文化遗产，对帝陵的历史营建及其成因进行深度解析。这一研究取向，突破了以往偏重形制描述的局限，将历史认知引入遗产保护领域，从而成为遗产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的重要突破口。与此同时，在政策导向推动下^②，研究重心逐步转向帝陵遗址公园化建设，并探索以遗址文旅融合与数字化展示等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纵观西汉帝陵研究历程，其正经历从“本体考据”到“空间认知”的深刻转型，前期成果虽已构建起对帝陵本体结构的系统性认识，却也凸显出学科分野所造成的局限。统计显示，

西汉帝陵研究视角总体上仍以考古学、中国古代史学为主。但已有约18.31%的文献从建筑学视角出发，聚焦陵园营建史及其遗产空间保护。这说明西汉帝陵研究正逐渐转向遗产空间认知与保护路径的体系化探索(图6)。近年来，景观考古学的引入，使得帝陵、城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空间关系受到

关注，突破了学科壁垒，也为理解西汉京畿城邑体系、地景规划及其人地互动过程提供了新的方向。

3 西汉帝陵遗产的空间认知与保护研究进展

基于西汉帝陵研究从“本体考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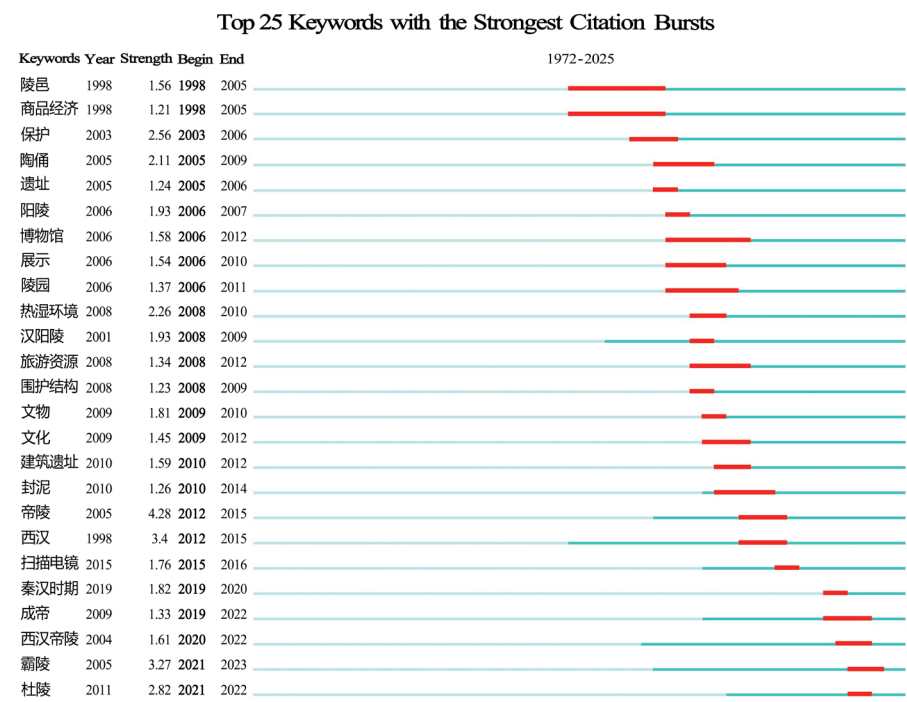


图3 关键词突现图谱
Fig.3 Keywords burst detection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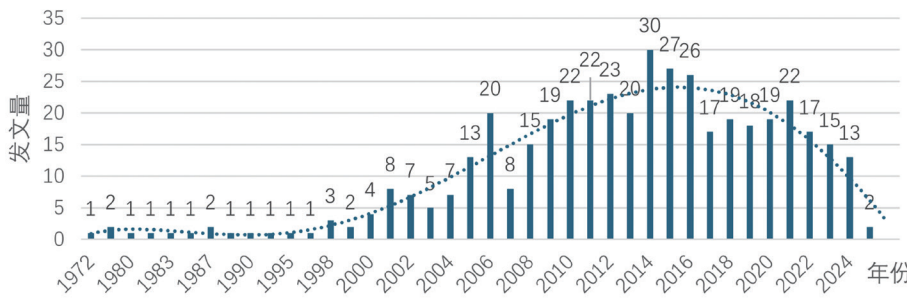


图4 1972—2025年帝陵文献发文量
Fig.4 Publication volume of imperial tomb literature (1972—2025)

① 1987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提到：对不妨碍基建的重要古墓葬、古遗址，在当前出土文物保护技术还没有完全过关的情况下，一般不进行发掘。

② 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促进文旅融合发展。2018年“文化强国”战略指出文化遗产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汉帝陵的研究需更加注重文化价值的挖掘和社会效益的发挥。2021年《“十四五”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规划》提出全面加强文物科技创新，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文物科技创新体系。

到“空间认知”的学术转向，以及未来其作为遗产空间的实践需要，本文将系统梳理与评述西汉帝陵在空间认知与保护利用方面的具体研究进展。

3.1 帝陵本体空间认知与土遗址保护

3.1.1 帝陵遗产空间认知

自 1980 年以来，国内考古团队多次对帝陵遗址进行发掘，并对西汉帝陵综合研究、单体帝陵与出土情况均有阐释^[4]。学者们对西汉帝陵的选址^[5]、朝向^[6]、形制要素^[7]、礼制^[3,8]等展开讨论，但早期研究中鲜少涉及帝陵附属结构。1998 年后，学者逐渐对陵园陵邑^[9]以及墓葬^[10]等奉陵部分开展专题讨论，并对阳陵、茂陵、霸陵、康陵、义陵等单体帝陵的陵园布局、墓葬形制及其内部遗址进行了深入研究。持续性的考古发掘工作也促进了对帝陵墙垣、壕沟、道路、门阙等设施遗迹^[11]以及动植物遗存^[12]、出土器物与陪葬制品^[13]等空间组成要素的考辨。随着参数化建模技术的发展应用，有学者复原了西汉营造尺的尺度（23.1 cm±5%），结合考古遗址平面数据，模拟长陵、阳陵园建筑的尺度比例与空间秩序^[14]。

除上述借助考古材料进行帝陵遗产本体的空间认知外，多学科介入下的帝陵风水选址与空间布局研究也同步展开。如探讨古代风水理论对西汉皇陵的选址、陵寝布局的影响^[15]，揭示了西汉帝陵在选址理念、园寝布局及营建礼俗的特征，并指出西汉帝陵建筑艺术所反映的“事死如生”的生死观代表着当时丧葬文化的最高水平^[16]。学者还将研究视界拓展至区域尺度，将帝陵封土、陵园形制方位与地理位置相结合，推测渭北西汉诸陵营建遵循统一规划，其布局体系可能存在预设的设计基准线^[17]；并在帝陵“东北-西南”基线基础上发现西汉长安京畿空间营造以 15 里^①为基准尺度，指出西汉诸陵以长陵为中心，按模数环绕建制在直径 150 里的圆内^[18]。这种跨越渭河南北的巨大空间尺度规划，揭示了西汉帝陵选址设计背后可能存在一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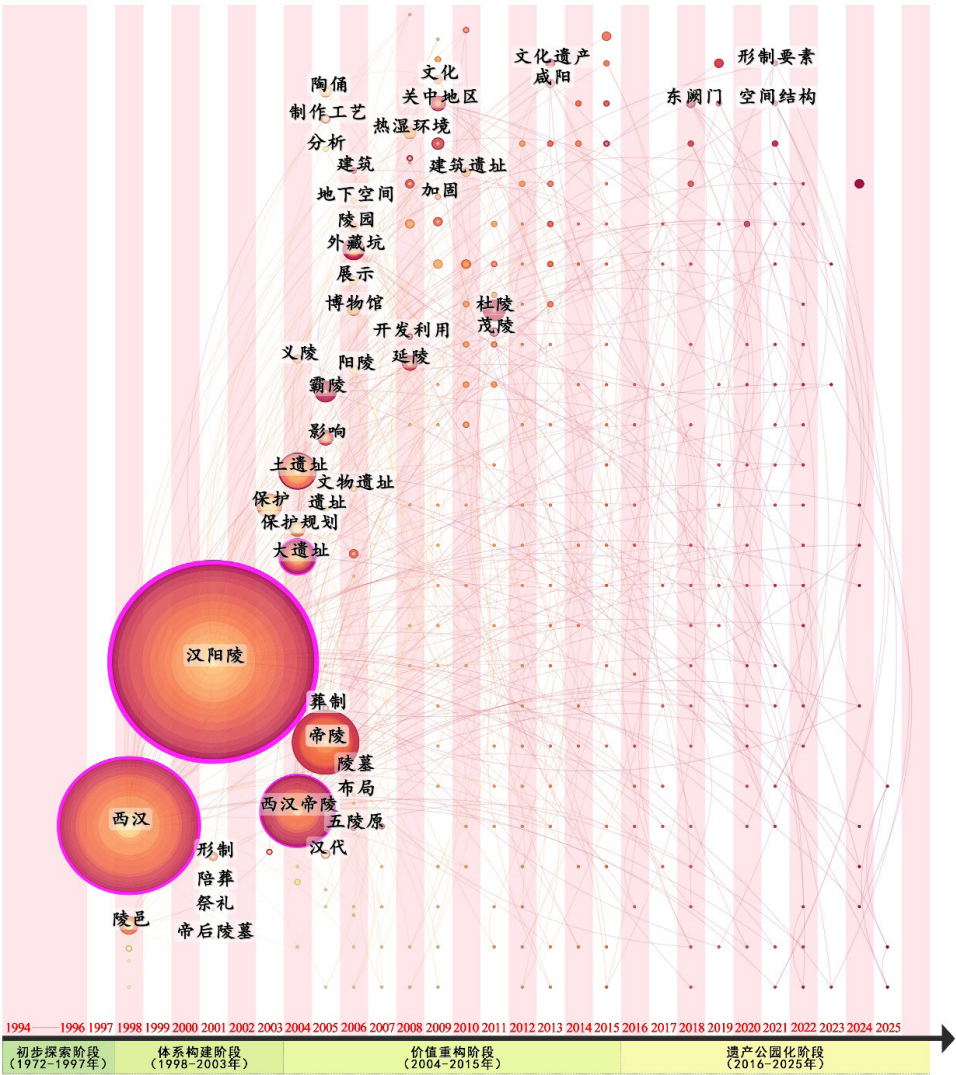


图 5 关键词时区图谱
Fig.5 Keywords time zone ma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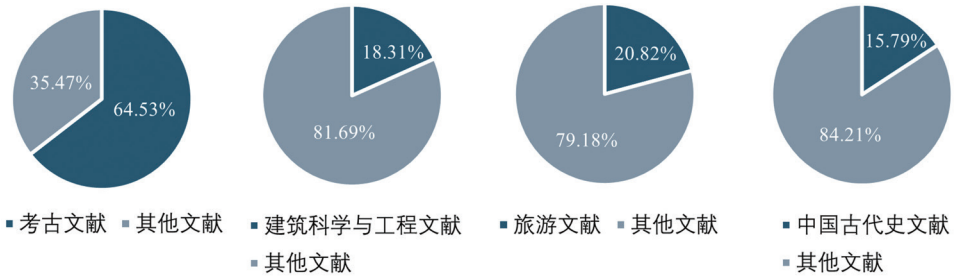


图 6 西汉帝陵文献类别占比
Fig.6 Proportion of document categories in Western Han imperial tombs

① 西汉一尺约 23.1 cm，六尺为一步，三百步为一里，则一里约为 415.8 m。

系统性的宇宙观和空间设计理念。这与《周礼》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的思想相吻合，反映了西汉时期“天地合和”的宇宙观念在都城与陵墓规划中的深刻体现^[19]。这种数字象征体系不仅是空间设计的技术规范，更是政治权力对空间秩序的符号化编码。除此之外，帝陵通过道路连接东渭桥，将渭北陵区与都城长安联结为一体^[20]。这一交通廊道不仅保障了陵寝祭祀与陵邑供应的日常需求，更作为京畿地区的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的动脉，强化了帝陵区域与京畿核心的功能联系。相关研究通过交通路线复原，进一步揭示了帝陵体系在关中地区城市网络的关键作用，印证了陵邑作为区域城市体系节点的功能定位^[21]。

对于帝陵选址、营建选取尺度与基线系统性的研究不仅还原了西汉帝陵的尺度特征，还揭示了营建中所蕴含的规划智慧。风景园林学界则发挥“地景”考察的专长，关注帝陵空间特征及其空间构成机制，聚焦西汉陵邑营建，从京畿角度、园邑一体、城邑本体三重尺度对空间组织与表现进行研究^[22]，为早期帝陵与地景关联研究打下基础，为西汉帝陵空间规划、城陵关系以及保护策略提供了创新性的思路与参考^[23]。

3.1.2 帝陵遗产土遗址保护

西汉帝陵核心与地面重要标志——“封土”构筑，是典型的土遗址。目前本体保护工作聚焦于“封土侵蚀成因”与“防治修复”。在封土侵蚀成因方面，学者研究发现封土由风成黄土夯筑而成，成土作用微弱，抗侵蚀能力差，亟需强化保护措施^[24]。有学者运用 RUSLE 模型，推算出康陵封土的高度已降低 1.22~1.59 m，为侵蚀评估和修复提供了基础数据^[25]。在土体防治修复方面，学者们系统分析了帝陵土体病害与成因，提出土体复位加固方法^[26]；并将研究拓展至同为帝王级陵墓的熊家冢墓坑^[27]与西夏陵六号陵^[28]的土遗迹保护，针对其开裂、墙体坍塌及墓道下陷等问题，采取了整体支护、加固保护、表层修复与注浆加固、补缝和土壤回填等措施。此外，首座多场耦合环境模拟实验室的建成运行^[29]，以及结合超声波雾化技术^[30]的创新运用，为帝陵等户外不可移动的土遗址抢救性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撑。聚焦西汉帝陵“封土”的研究不仅深化了学界对土遗址材料特性的认知，更为后续帝陵本体封土与地下墓园的维护修缮提供了重要参考。

3.2 帝陵遗产的公园化保护与规划转型

3.2.1 帝陵遗产保护理念的革新

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革新，陵寝类遗产的研究与实践逐渐从传统的“静态保护”转向“活化利用”。风景园林学科以其在开放空间规划、生态修复与公共游憩等方面的专业优势，推动了“考古遗址公园”成为有效的帝陵

遗产管护与利用模式。遗址公园通过复原古代人类生存环境的典型范例，在保护遗产的同时让公众了解人类历史^[31]。我国考古遗址公园的发展历程，以 1985 年 6 月“圆明园遗址公园”^①正式开放为标志性起点，其为我国遗址考古公园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

2005 年，《“十一五”期间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颁布，明确要求建设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遗址公园），并初步建成和完善秦始皇陵、阳陵等遗址公园，这标志着国家层面对帝陵遗址公园建设的系统推进。2009 年，国家文物局印发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次年阳陵入选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②，这不仅推动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制度成形，也为 2014 年国家文物局同意西汉帝陵（五陵塬片区）遗址公园概念规划项目与 2017 年杜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奠定了基础。2023 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展报告（2018—2022）》颁布，表明汉阳陵等 55 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发展取得阶段性进展，遗址保护状况明显改善。2025 年 8 月，茂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正式立项，标志着打造以陵园及周边环境为主体，集文博、科教、展示、娱游等功能一体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的活化利用理念被大众认同。西汉帝陵遗产的公园化保护路径成为连接学术研究、公众教育与可持续利用的关键纽带。

3.2.2 帝陵遗产公园规划设计的目标

自帝陵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建设以来，其实践研究已从传统规划设计走向对其场所精神、共生机制、文化体验、游客活动等关注。帝陵遗址公园的规划需根据当前帝陵保护开发现状，以大遗址背景下的分区规划为基础^[32]，对比分析国内外大遗址保护情况^[33]以及遗址公园旅游文化、生态开发及考古展示等开发模式^[34]，针对性地借鉴保护经验^[35]；进而结合各帝陵遗址区位、历史文化资源、生态环境条件，分别提出遗址区保护开发总体思路、实施路径^[36]以及不同层面保护规划策略。

以杜陵为例，刘雷提出将杜陵邑纳入整体规划框架，并依托遗址本体推动杜陵考古遗址公园建设^[37]；权东计则进一步利用文本挖掘构建了城市大遗址规划编制影响评估指标体系，对杜陵考古遗址公园提出展示调整、风貌控制、拆迁补偿等建议^[38]。基于既有帝陵保护规划的系统性框架，学者们进一步探讨帝陵遗址公园的详细设计，通过系统梳理大遗址及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历程，立足政策导向，统筹多元方法协调保护与展示的动态平衡^[39]，围绕遗址公园的“本体+环境+文化”展示体系^[40]进行研究，对植物景观、游步道、出入口^[41]以及标识系统^[42]等进行详细设计。

帝陵遗址公园化实践研究已初步形成“保护优先、多元展示、生态共生”的共识，保护理念也逐渐向西汉帝陵整体

① 1980 年，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家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专家学者等发出了“保护整修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1981 年，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在 10 月 18 日的《北京日报》上提出“建议迅速建设圆明园遗址公园”。1985 年 6 月，圆明园遗址公园正式开放，成为我国最早的由政府力量主导、通过统筹规划、以文物保护为核心、以科研成果为基础建成的“遗址公园”。

②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研究阐释、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文化空间。

保护靠近,但现有成果多从生态景观、旅游开发或考古展示等单一领域切入,后续研究还应推进各帝陵的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推动“保护-展示-开发-运营”全链条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

3.3 帝陵遗产的整体保护与空间适应

3.3.1 帝陵遗产文旅融合

2016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遗产活化利用,促进文旅融合。在西汉帝陵遗址逐渐公园化的背景下,旅游业应运而生,使得遗址的活化利用呈现出愈发显著的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共存现象。西汉帝陵分布于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与渭河以南的白鹿原北端及南郊的少陵原一带,现分属咸阳、西安多个行政区域。各帝陵的经营是西汉系统统筹的结果,故其整体性空间保护与展示是推动西汉帝陵遗产价值认知的重要任务。同时,从大遗址保护与文化遗迹的协同展示角度看,如何整合大遗址区的文化遗迹点,形成遗产保护廊道与文化线路,也是活化利用与提升公众文化认知水平的重要途径。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通过分析帝陵遗产空间网络系统,揭示了“城”与“陵”的内在关联与空间结构^[22-23],为理解并协调二者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的研究路径与解决策略。

2021年颁布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十四五”专项规划》(文物保发〔2021〕29号)中,西汉帝陵被列入大遗址展示提升工程,旨在提升大遗址的开放服务水平,为人民提供开放共享、底蕴深厚的公共空间。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陕西省主会场上,陕西省文物局公布了首批文物主题游径——“大汉紫道”,游径串联了茂陵、平陵等8个帝陵,标志着帝陵遗产从封闭保护向文旅融合的功能转型。在理念更新、政策引导与技术支撑的背景下,学者们将陕西帝陵视为整体,构建了帝王陵墓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强调“环大西安旅游圈”的旅游资源丰富,应以汉、唐帝王陵园为主打旅游产品^[43];指出五陵原应以帝陵文化遗产主题体验精品旅游走廊为抓手^[44],咸阳陵墓旅游则应着力构建景区化、体验化、休闲化发展路径^[45]。另有学者利用爬虫技术构建帝陵间交通和旅游网络关系矩阵,识别帝陵间的网络节点、集群、轴线,形成“点-群-轴-网”空间保护网络结构^[46];还基于对遗址资源的分析、评价和定级,构建渭北帝陵遗产廊道规划框架^[47];并对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汉帝陵主题区遗产廊道进行建构设想^[48]。部分研究进一步拓展至城陵关系领域,在辨析城陵发展矛盾以及复杂耦合关系基础上,依托城市双修理念,提出如“隐城于自然山水、融陵于城市内部”的城市双修策略,“以陵养城、以造塑陵、城陵共融”的共生策略^[49],以及创新城陵融合发展的路径^[50],以重塑帝陵圣地意境。

3.3.2 帝陵遗产社区协同

遗址保护的方式可分为“遗迹保护型”“遗迹弘扬文化型”“旅游促进保护型”3类。我国早期以遗迹保护型为主^[37],而近年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推广,保护理念已从对遗产“最初状态”的保护,转变为对遗产进行“适应性改变”与“多

元化活化利用”。在遗址活化理念驱动下,西汉帝陵保护逐渐与文旅相融合,转向与城市和社区共生^[51]。

早在1992年联合国颁布的《21世纪议程》中便有多条提到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原住民及当地社区居民应当有效参与到遗产地可持续发展实践中^[52]。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也不断出现鼓励公众参与遗产保护的研究实践^[53]。有研究指出社区居民整体参与缺位将导致遗产保护与旅游双重困境,促进社区居民在地化参与才是遗产保护工作可持续的基础^[54]。权东计等提出杜陵“社区-遗址”共生机制以促进社区参与大遗址文化产业集群发展^[55]。在数字化网络时代背景下,采用建立数据库、数字档案馆等非接触式参与方式能显著提高社区居民的参与度^[56]。此外,公众从考古的旁观者转化为主动参与者,充分参与从调查、整理到阐释的每个考古学环节^[57],这种理念转变不仅增强了社区居民对于考古遗址的文化认同感,还为平衡文化遗址与现代人居提供了经验^[58]。

旅游开发中不免会出现发展与遗产保护之间的选择,西汉帝陵自产生便与社区(西汉时已设“陵邑”)相勾连,换言之其自古便融入区域人居生态体系。持续性的人居建设活动与快速城镇化建设严重损害了西汉帝陵及陪葬墓遗址的整体风貌,如平整土地运动、采石场大量开山采石、村民自行扩大耕地、宅基地改扩建等行为^[59]。因而,在当代保护实践中,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权益博弈日益凸显,保护的过程通常会涉及原住民搬迁或异地安置^[54]，“社区-遗产”平衡问题成为帝陵研究不可回避的课题。当前学界研究普遍肯定了社区参与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但目前研究存在一定局限:1)现有成果多聚焦于考古知识的公众传播,忽视了对遗址本体保护的考量,未触及遗产保护的本质。2)社区考古等若控制不当,容易对遗产产生负面影响^[60],甚至对遗址本体造成二次损坏^[61]。3)针对帝王陵寝类遗址与社区发展的互动关系研究,目前尚未形成具有理论深度的系统性成果,相关实证研究数量明显不足。

3.4 帝陵遗产的保护动向

从既有公开发表研究的覆盖情况来看,西汉帝陵相关研究在对象与尺度上仍存在不均衡现象:目前仅2座城郊型陵墓具备系统性规划研究,其余9座郊县型陵墓仍存在学术缺口。这一现象主要源于既往基于考古学的帝陵保护多聚焦于单体,尽管考古材料不断涌现,研究却长期处于零散状态;同时,即便已建成国家遗址公园的个案,也面临着游客吸引力不足、公众认知局限双重困境。具体而言,现有考古遗址公园游观体系、游憩行为研究尚停留在感性分析阶段,公园的空间品质与建筑风貌也亟待优化,且公众对遗址公园的认知大多局限于“西汉帝王的墓葬”,说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及空间体验未得到充分阐释与营造。

西汉帝陵作为特殊类型的空间营造,体现了与都城建制相融合的特征,现有研究虽已关注其形制布局,但地景尺度研究尚有不足。历经数十年的帝陵遗产本体空间认知已为多学科交叉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近年来,风景园林学科以“地

景”为切入口进行多尺度空间阐释,并通过整合相关考古成果与跨学科合作,持续揭示帝陵在多维地景下的空间形塑机制。未来应进一步推动帝陵遗产地整体保护与景观提升工作,深化“城-陵”空间耦合研究。首先,应加强西汉帝陵为代表的大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在规划中严格控制建设强度,如建筑高度、体量、色彩等,以减轻周边建成环境对帝陵及陵邑整体风貌的视觉压力;其次,应在设计中构建联系陵园、陵邑的景观通廊以及二者历史空间的对望格局,再现其历史空间秩序;最后,还需完善帝陵考古遗址公园游步体系与视听体验,促进“保护-展示-开发-运营”全链条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此外,应加强帝陵遗产与社区的有机联系,实现文化遗产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还需将帝陵置于更宏大的空间背景中,探讨其“城-景”协同的历时性演变规律,从风景园林视角审视其作为遗产的空间组织逻辑与历时性变迁,从而全面彰显西汉帝陵作为帝王级遗产的重要价值,也为其遗产的活化保护提供理论支持,并在此基础上推进空间保护策略的建构。

4 结语

本文基于 CNKI 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系统梳理了帝陵的研究现状与研究热点。研究发现,1972—2025 年西汉帝陵相关文献的年发表数量总体呈现增长趋势,但近年来研究数量减少,关注度有所下降;研究主力多来自考古学、中国古代史学等学科,建筑学领域学者为少数,且研究相对独立。现有空间认知与保护研究可分为 3 个层级:一是围绕考古发掘成果及相关史籍记载,对其形制、礼制、陵园陵邑构成及其区域空间格局所开展的历史考据研究;二是围绕帝陵封土、地下墓室的病理研究与防治修复研究;三是结合大遗址保护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旅融合以及城陵关系研究等帝陵活化研究。然而风景园林专业在西汉帝陵遗存的多尺度空间转译与保护利用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基于研究成果,提出在多学科研究基础上,未来应突破以单体遗存为主的传统路径,进一步转向帝陵遗产地的整体性认知与系统性保护,在深化“城-陵”空间耦合及地景尺度研究的基础上,统筹推进保护规划编制、景观风貌控制、展示游憩体系优化与社区协同发展,从而为西汉帝陵遗产的活化利用与空间保护策略建构提供支撑。

研究将文献计量可视化同政策解读相结合,构建以计量分析结果为线索的质性综述路径,从而系统呈现帝陵研究热点与阶段性演进特点;并从风景园林的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认知与土遗址保护-公园化保护与规划转型-文旅融合与空间适应性协同”三位一体的空间认知与保护框架,为理解帝陵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理论参考。但本文以 CNKI 数据库为主要数据来源,其样本文献的覆盖范围、收录偏好与检索式设定可能对发文趋势、热点识别与聚类结构产生影响。未来研究可通过纳入更广泛的数据源加以补充验证。

注:图片均由作者自绘。

参考文献:

- [1] 韩国河,王芳.古代帝陵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考古与文物,2023(4):64-70.
- [2] 胡凯富,郑曦.基于 CiteSpace 计量分析的景观绩效研究重点领域和前沿趋势的文献述评[J].风景园林,2018,25(11):84-89.
- [3] 马永赢.从“将作大匠”看西汉帝陵的变化[J].考古与文物,2009(4):72-76.
- [4] 李岗,田亚岐,肖健一,等.2008~2017 年陕西秦汉考古综述[J].考古与文物,2018(5):66-110.
- [5] 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帝陵选址研究[J].考古,2011(11):76-82,113.
- [6] 朱晨露,赵钧陶.西汉帝陵朝向新探[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8(2):96-104.
- [7] 焦南峰.西汉帝陵形制要素的分析与推定[J].考古与文物,2013(5):72-81.
- [8] 朱峰,杜忠潮.论西汉帝陵位次排列中的昭穆制度[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1):25-30.
- [9] 杨武站.论西汉陵邑的功能[J].考古与文物,2017(3):88-93.
- [10] 齐广.西汉帝陵墓园初步研究[J].南方文物,2024(5):125-132.
- [11] 张明惠,杨武站,葛西军,等.汉武帝茂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2):3-13.
- [12] 胡松梅,杨武站.汉阳陵帝陵陵园外藏坑出土的动物骨骼及其意义[J].考古与文物,2010(5):104-110,119-121,123.
- [13] 石宁.西汉帝陵汉阳陵陪葬墓出土玉器赏析[J].收藏界,2008(12):78-79.
- [14] 孟玉,林源.西汉营造尺尺度初探[J].建筑史学刊,2022,3(1):60-69.
- [15] 韩养民,韩小晶.风水与西汉陵[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65-70.
- [16] 刘华祝.西汉帝陵营建礼俗略述[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1):12-14.
- [17] 杨哲峰.渭北西汉帝陵布局设计之观察[J].文物,2009(4):61-68.
- [18] 于志飞,王紫微.经纬圆方——汉长安城及其近畿空间尺度设计研究[J].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5(3):66-75.
- [19] 徐斌.法天地而居之——汉长安象天法地规划思想初探[J].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6,8(1):83-111.
- [20] 梁云,游富祥,郭峰.汉渭河三桥的新发现[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4):27-34.
- [21] 辛德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之一[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3):85-113.
- [22] 李奕成,耿华峰,成玉宁.整体性保护理念下西汉时期陵邑营建的多尺度空间组织与表现[J].中国文化遗产,2024(6):53-63.
- [23] 段婷.文化景观视角下西汉帝陵遗址景观空间构成机制[J].城市建筑,2021,18(7):178-181.
- [24] 董莉丽,杨波.基于参数法的西汉帝陵封土土壤粒度端元分析[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23,38(4):46-52.
- [25] 杨波,董莉丽.西汉康陵封土侵蚀和高度估算研究[J].地理空间信息,2019,17(4):10,51-53,87.
- [26] 白冬梅,程蓓,陈波.危险土体复位加固技术在汉阳陵帝陵南阙门遗址保护中的应用[J].文博,2015(6):95-98.
- [27] 陈光利,魏彦飞,袁万红,等.熊家冢土遗址保护概述[J].东南文化,2009(3):114-118.
- [28] 张博,王旭东,郭青林,等.西夏陵夯补支顶加固工艺质量控制研究[J].敦煌研究,2016(5):135-141.
- [29] 新华网.我国文化遗产领域首个多场耦合实验室正式投运[EB/

OL]. (2020-12-18) [2025-11-3].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12/18/c_1126877480.htm.

[30] 常彬, 李佳轩, 李库, 等. 超声波雾化技术在汉阳陵土遗址补水保护实验 [J]. 西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5, 55 (2): 379-388.

[31] 金兰兰. 遗址的景观重构方法及价值呈现——基于复写理论的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景观营建研究 [J]. 中国园林, 2022, 38 (S2): 53-57.

[32] 谢得娟, 王小林, 叶春旺, 等. 基于生态修复理念的西汉帝陵大遗址生态景观规划设计研究 [J]. 北方园艺, 2011 (13): 98-101.

[33] 张静. 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大遗址保护开发研究 [D]. 西安: 长安大学, 2016.

[34] 牛宇轩. 遗址公园开发模式研究 [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

[35] 黄翊珊. 西汉宣帝杜陵保护与利用研究 [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9.

[36] 潘万程. 基于共生共融理念的遗址公园景观设计策略研究 [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2.

[37] 刘雷, 林楚燕. 陵苑的对话——西安杜陵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 [C]//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南京市政府. 转型与重构——2011 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11.

[38] 权东计, 呼凯玥, 朱海霞. 基于文本挖掘的城市大遗址规划编制影响评估体系探析——以杜陵为例 [J]. 中国软科学, 2021 (S1): 140-147.

[39] 赵迪. 西汉帝陵陵寝类遗址景观设计研究 [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1.

[40] 赵金磊. 西汉帝陵遗址展示规划研究 [D]. 西安: 西北大学, 2020.

[41] 刘锡安, 李广. 杜陵遗址公园景观规划设计探究 [J]. 现代园艺, 2017 (10): 109-110.

[42] 张喻星, 陈亮.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视域下的遗址阐释与展示——以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标识系统建设为例 [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4 (20): 157-160.

[43] 杜忠潮, 邢东兴, 李玲. 汉唐帝陵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分析——陕西省茂陵、乾陵实证研究 [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7 (1): 73-77.

[44] 杨尚英, 李玲. 五陵原帝陵文化遗产主题体验精品旅游走廊开发探讨 [J]. 安徽农业科学, 2010, 38 (19): 10306-10307, 10473.

[45] 崔杜娟, 孙虎. 陕西咸阳古陵墓旅游资源开发与研究 [J]. 科技创新导报, 2010 (7): 215.

[46] 杨钰华, 芮旸, 王兴, 等. 聚落型文化遗产整合保护空间网络构建研究——以陕西省汉唐帝陵群为例 [J].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1, 37 (1): 98-105.

[47] 董钰. 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渭北西汉帝陵遗产廊道规划研究 [D]. 西安: 西北大学, 2018.

[48] 张捷. 基于德尔菲法的遗产廊道建构探析——以渭河西咸新区段为例 [J]. 中国名城, 2018 (7): 80-88.

[49] 尹秀梅, 张凯莉. 城镇更新中帝陵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研究 [J]. 小城镇建设, 2020, 38 (9): 53-60.

[50] 吴左宾, 王泽民, 王笑一, 等. 城陵共融: 黄陵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创新路径探索 [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4, 56 (3): 400-408.

[51] 陈冲. 西汉帝陵遗址区村落保护与更新策略研究 [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20.

[52] 金一, 严国泰. 基于社区参与的文化景观遗产可持续发展思考 [J]. 中国园林, 2015, 31 (3): 106-109.

[53] 丁枫, 阮仪三. 我国公众参与城乡遗产保护问题初探 [J]. 上海城市规划, 2016 (5): 46-49.

[54] 周小凤, 张朝枝, 蒋钦宇, 等. 搬, 还是不搬? ——遗产化与旅游化情境下的社区居民搬迁研究 [J]. 旅游学刊, 2022, 37 (3): 83-95.

[55] 权东计, 任宜欣, 朱海霞. 共生视角下的大遗址区遗产社区生活圈营造策略研究——以杜陵遗产社区为例 [J]. 中国软科学, 2021 (S1): 198-205.

[56] 孙磊磊, 陈荣山, 孙东灵, 等. “活态遗产”: 苏州园林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与创新模式探析 [J]. 中国名城, 2023, 37 (8): 74-80.

[57] 徐坚. 社区考古学: 文化遗产管理还是考古学研究 [J]. 东南文化, 2011 (5): 38-44.

[58] 王涛, 王涵, 朱静宜. 从“你们”到“咱们”——河南荥阳楚湾遗址社区考古的实践与思考 [J]. 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 2024, 9 (1): 12-19.

[59] 孙瑞遥. 汉唐帝陵数字化的传承创新路径研究 [J]. 新美域, 2024 (9): 61-63.

[60] 张多. 社区参与、社区缺位还是社区主义? ——哈尼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困境 [J]. 西北民族研究, 2018 (2): 33-42.

[61] 张铭心, 徐婉玲. 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参与研究——以高昌故城为例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7 (3): 35-42.

作者简介:

吕兰琦/2002 年生/女/贵州贵阳人/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 400715)/在读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

李奕成 (* 通信作者)/1988 年生/男/湖南衡阳人/博士/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重庆 400715)/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历史理论与遗产保护/E-mail: leeyeecheng@126.com